

民国时期档案文献成果研究

石博文

(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 201204)

【摘要】对形成于1912年至1949年期间档案研究相关期刊和著作进行统计,对文献的来源、研究主体、研究时间、研究内容等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民国时期档案学学术研究的特点、优势及不足之处,以期对当下的档案学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档案学; 民国; 行政效率运动; 行政学; 史学; 图书馆学

引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国近代档案学产生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先进的档案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本文从民国时期档案学术期刊和著作出发,对档案学学术成果进行剖析和研究,凝练民国时期档案学学术研究的特点,以期对后续研究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文献来源

(一) 发表期刊分布

本文在《晚晴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以“档案”为检索词,以1912年至1949年为时间界限,得到有效期刊文献929篇。作者首先对民国时期发表过档案类文章的期刊社进行分析,发表档案类文章数量在5篇以上的期刊共计10家,详见表1。

《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文章647篇,数量遥遥领先。《北京大学日刊》于1917年11月创刊,由北京大学编辑并出版,是中国第一家高校校报,主要登载北大的各学科课目、设施、规章制度和集会通知等。这647篇文章均为1922年至1926年期间北京大学京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情况的报告。1922年,经众多专家学者多方争取,历史博物馆所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移交给北京大学进行收管。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专门成立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负责该批档案的分类和整理,其人员包括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中国文学系的本校师生、毕业生和校外专家。《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刊登了整理出的档案目录、摘要甚至全文^[1],因此该期刊的档案相关研究发文量位居第一。

《行政效率》刊发文章62篇。为提高行政工作效率,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行政效率研究会,对行政工作效率开展专门改革和研究,并创办机关刊物《行政效率》。《行政效率》主要刊载行政研究论文、调查报告和行政改革消息,以及关于行政研究和改

革消息的文章索引。1936年《行政效率》改为《行政研究》,1937年因抗战而中断。在《行政效率》和《行政研究》刊发的文章中,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档案管理方法和制度的探讨,铁道部、行政院等部门档案管理工作实践,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研究,国外档案管理工作情况介绍,行政改革消息等。《行政效率》创刊后,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习交流的平台,引入了国外先进的档案管理理念和方法,扩大了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了民国时期档案工作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虽没有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而行政学、图书馆学类期刊为档案学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促进了档案学学术研究和档案事业发展。

序号	期刊名称	数量
1	北京大学日刊	647
2	行政效率	62
3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4
4	协和报	13
5	文藻月刊	10
6	北平特别市市政公报	10
7	人文(上海1930)	8
8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7
9	法令周刊	5
10	故宫周刊	5

表1 民国时期档案类期刊分布(作者自制)

(二) 著作出版单位

在《民国时期文献资源库》内,分别以“档案”“文书”“公文”为检索词,以1912年至1949年为时

间界限,得到有效文献160篇,文献类型主要为著作。本文基于以上文献,对民国时期档案相关著作成果进行分析。

档案相关著作中,以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发行数量居于前三名(见表2),这三大出版社在民国时期出版行业三足鼎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些出版社发行了档案相关书籍,一些政府部门或企业也直接印发了共27本档案著作。这些成果与其说是书籍,更像是档案业务工作手册,一方面是对本单位档案工作方法的规定,另一方面通过手册编发进行档案业务工作交流 and 分享。

序号	出版单位	篇数
1	商务印书馆	14
2	世界书局	8
3	中华书局	6
4	春明书店	4
5	华中图书公司	4
6	实学书局	4
7	正中书局	4
8	大东书局	3
9	大方书局	3
10	法学书局	3
11	会文堂新记书局	3
12	政府部门、企业	27

表2 民国时期档案类著作出版单位分布(作者自制)

(三) 研究时间

民国时期档案相关文献研究时间分布见图1,由图可知,自1913年开始有档案文献出现,发文量随着年度呈现2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22年至1926年期间,发文量664篇。该时段正值前文所述北京大学京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发表研究报告时期,因此发文量居高不下。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34至1937年,发文量165篇。1933年,国民政府开始推行“行政效率运动”。行政效率运动的重要突破口即为文书档案改革。文书档案改革具体而言也就是文书档案连锁法的实行,即简化文书的收发、登记、编号等手续,加速文件运转。随着行政效率运动的开展,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要目的的研究也如火如荼,达到了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程度。因此,1934至1937年期间产生的文献多为对档案整理方法的探讨,旨在提高文书管理和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这期间的研究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和档案学的产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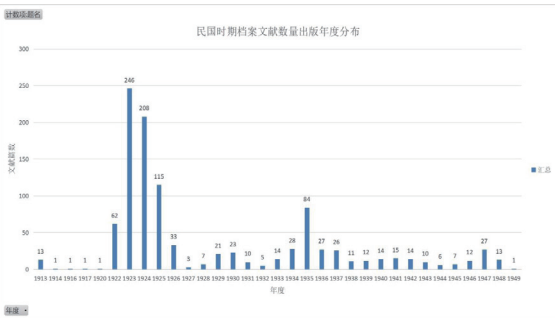


图1 民国时期档案文献数量出版年度分布(作者自制)

二、研究内容

(一) 关于公文的研究

1. 公文档案改革研究

何鲁成在1934年撰写改革档案管理刍议一文,分析了改革档案的重要性,阐述了各种管理档案的方法,提出改革档案的几个问题,最后提出改革档案的研究方法。李达五在1935年提出文书档案连锁试验中之公文用纸改革,先分析了现行公文用纸的缺点,而后提出改良用纸式样办法。甘乃光在1937年对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回顾,通过收发文单的改良、公文检查的改革、戳记的改良、档案的整理几个方面回顾了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成果,他被《行政研究》期刊誉为“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创始者”。陈国琛著《文书改革在台湾》是对改革文书档案的经验及其方法在台湾推行情况的记录^[2]。

2. 公文的程式及处理

在诸多著作中,标题中包含“公文书式”的多达71篇,均为对不同时期公文书式的解析,内容包含军政公文书式、保甲公文书式、学校公文函牍公文书式等内容,既有国民政府公文书式,又有华北临时政府、伪满洲国政府、汪伪政府的公文书式,所列程式分呈、咨、公函、令、布告、批等多类。关于公文处理方法的研究范围包括军政部、交通部、邮局、国务院、司法、外交、教育等各部门公文处理方法,内容十分详尽。

(二) 关于档案的研究

1. 档案管理方法

民国时期对档案管理方法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中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处理》《档案科学管理法》等著作均是关于档案管理方法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档案管理的文章发表,内容涵盖档案分类、保存、排列等。例如,《天津市》期刊客观评价了天津市府现行档案分类法:较过去进步,惟尚欠灵活^[3]。

2. 档案业务交流与宣传

民国时期的档案文献成果中,有较大部分是关于档案业务交流和宣传的内容,各个部门在刊物上发表本部门档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如,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介绍了本局档案之整理业务;赵肖甫介绍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整理档案的情况;程长源介绍了兰溪实验县县政府整理教育部分档案的尝试;国立同济大学介绍了本校整理文书档案的情况。

3. 档案教育

20世纪30年代,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专科,学制2年,开设档案课程,培养了民国时期较早的一批档案人才,他们在档案工作及档案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了“私立武昌文华图专开设档案管理讲习班”、“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班招生”、“文华图专举行毕业仪式”的消息。

4. 档案史料研究

民国时期,许多学者根据档案史料,开展了大量史学研究。1930年至1931年期间,《故宫周刊》上刊载4篇《辛亥档案》,对辛亥革命档案研究情况进行专题报道。“辛亥档案本院检查清庭档案所得,其中多有关于辛亥革命清庭与疆吏往返文电,为清室及民国嬗递时期重要史料,但首尾不全者,兹为摘要刊登本刊……”1935年至1936年期间,《人文(上海1930)》上连续刊载嘉庆和珅档案8篇。《河南博物馆馆刊》在1936年刊发了道光二十一年黄河围城档案。

5. 国外档案工作

近代中国档案学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档案管理理念,尤其是欧美等国的经验,当时的档案学著作大多带有欧美档案学的理论色彩。傅振伦还在《公文档案管理法》的书末附录有《欧美档案馆学论文译丛提要》,殷仲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是民国时期档案学著作中吸收国外档案学最多的专著,不仅有“档案之简史”一章介绍各国的档案管理工作,还在档案的定义、作用、组织体系、档案教育、人事、对外研究及考察等方面,共十处以上涉及国外档案学理论和方法。

三、研究成果评价及启示

(一)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
自1913年开始,文书档案类的文献相继问世,此后关于文书处理、公文程式、公文写作、文书档案改革等内容的文献不断涌现。1912年至1949年期间,共产生了160篇文书档案相关著作、期刊文献929篇。这些成果反映了近代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这些文献成果是对民国时期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建立了档案管理的基本框架,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档案学理论。1935年,“档案学”一词正式问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标志着中国档案学的产生。从此,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开始有了档案学这门学科。因此,可以说民国时期档案文献标志着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其质量代表了当时中国档案学发展的高度。

(二)研究成果受行政学、图书馆学、史学等影响较大

民国时期,档案学产生及发展受行政学、图书馆学、史学等学科影响较大,其有关研究成果也势必受这些学科的影响。一是行政效率运动推动文书档案改革。我国档案学的产生有着浓厚的行政色彩,相关研究成果也难以脱离行政学学科。二是我国档案学产生初期大量借鉴了图书馆学的方法。程长源、周连宽等许多档案学专家都来自于图书馆领域,将图书馆学的方法大量应用于档案管理和档案学研究中。三是“八千麻袋事件”后,史学界对档案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重视日增。受以上学科影响,档案界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却是分散于行政学、图书馆学和史学等刊物上,并未创建独立的档案学期刊,关于档案管理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

(三)研究内容多为政府档案工作经验的总结

从文献的研究内容来看,有许多期刊是档案业务工作情况的交流,许多著作是对本机关档案室工作的总结,如朱希祖的《整理升平署档案记》,是对升平署档案之来源、升平署之制度等的总结。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是对浙江兰溪县政府整理档案业务经验的提炼。《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是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介绍该馆所藏档案的整理方法。因此,民国时期的档案文献多为本机关档案工作经验或个人经验的直接总结,缺乏对理论的抽象和概括,著作和零散的文章的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档案学理论体系,难以发挥普遍的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郭鹏. 北京大学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及其启示[J]. 山西档案. 2016(6): 15-17.
- [2] 陈国琛. 文书改革在台湾[M]. 台湾: 台湾书店, 1947.
- [3] 市府现行档案分类法的批评: 较过去进步· 惟尚欠灵活[J]. 天津市, 1947, 3(8): 8-9.

作者简介:

石博文(1983-), 男, 硕士, 上海海关学院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 档案管理及档案史。